

# 记者调查：珠三角“民工荒”真相



资料图片

## 核心提示

参加10月28日“广佛同城”专场招聘会的佛山市东泰机械厂人力资源部负责人魏小姐，上午9点半正式进场设摊与求职者面对面沟通。这家企业贴出的招聘海报上显示，招聘岗位包括数控车工、铣工、钳工等10多个人。一个小时过去了，魏小姐遗憾地告诉记者：虽然前来咨询的大约有十人，但她没有留下一份求职登记表，也没有发出一张面试通知单。她说，今年8月以来企业参加过多次现场招聘会，“基本上每个月来七、八次，但一直招不满。”

但记者在现场招聘会看到的却是人气旺盛的场景。就在当天，佛山市就业服务中心公布的数据说，这次招聘会广州、佛山两地共有63家企业进场设摊招聘，其中佛山企业38家、广州企业25家，共提供电子、机械、餐饮等招聘岗位3300个，参与招聘会求职者也达3000多人。

珠三角新一轮“民工荒”的说法，自今年8、9月出现以来，一直被外界传诵至今。不过从事人力资源、就业服务工作等的相关研究者，却基本采取审慎否认的态度——“请不要轻易说‘荒’，真实的情况、真正的定义是暂时出现阶段性的普工短缺。”

## 来自就业市场招聘会信息：供求两旺

“企业说，我招不到人；求职者也说，我找不到工作。所以，我们不承认有‘民工荒’。”佛山市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梁振新说，“就拿本次招聘会说，如果一对一，刚好填满。但是，这不是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也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可能3000个岗位一天招满，3000个求

职者也不可能一天就找到工作。这表明，双向选择存在差异，只是求职者的供给与企业的需求不能匹配。”

企业“求贤若渴”，求职者同样“找工作心切”——这是记者近期多次到珠三角劳动力市场采访发现的普遍现象。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提供的数字显示，企业登记招聘需求在今年下半年呈现波浪形回升。从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采集的企业空缺岗位看，1-9月呈现波浪形盘整回升，并以4月份为分水岭，逐月向上攀升，呈现向好趋势。

在今年1-9月，佛山市就业服务机构共有106万人次求职，提供岗位74万个，三级就业服务机构过去9个月举办了1150场招聘会，成功介绍各类劳动者就业20万人次。就业市场供求数字在下半年开始出现由冷转热的变化。佛山市在今年3-5月时，全市提供的岗位（包括收集和现场招聘的）是每月5-6万个，从6月开始逐渐增加，6月是7.3万个，7月也保持7.11万个，到8月是8.3万个岗位，用工形势正在好转，求职者增幅不大，三个月以来保持在每月9-10万人次。

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服务中心主任张宝颖告诉记者，广州今年1至9月，全市人力资源市场供求总量达到260万左右，其中企业提供岗位约140万个，求职者大约在120万人左右。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求人倍率已经上升到1.16，也就是有1.16个岗位对应一个求职者，比上半年的1.05有所上升，出现比较好的势头。

梁振新说，目前佛山缺口6-7万人，其中大约缺技术工人2万左右，普通工人5万左右。这是正常现象，他说，“但这个缺口，不是没人，是有人在这里，只是有些工不去做，有些技术活他们又做不了。”

## 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差异

“主要原因是符合企业条件的工人不多。”魏小姐说，前来求职的工人，往往本身技术水平不够，等企业开出面试条，请他到了厂里一试就知道底细了，可偏偏他们要求的待遇又很高。魏小姐所在企业贴出的招聘栏，各类工种

的工资收入基本写着“1600-1800元”。魏小姐说，这是指底薪，一般都用计件工资方法，工人普遍能拿到2000多到3000块的。但是她承认，从企业角度看，企业只愿意挑选有经验的工人，因为企业很难付出时间、金钱来培养等待工人慢慢成长。

手拿求职登记表的湖南人谭明强是一名钳工熟练工，今年27岁，来广东工作已近十年。他和另一位老乡在招聘会上寻寻觅觅，未能找到满意的工作。他说：“今年做过两家厂，都出来了，觉得收入不行。”

梁振新认为，目前出现结构性问题，一方面是用人单位的岗位要求，求职者达不到，所以出现工人找不到工；二是用人单位的工资福利待遇达不到求职者要求，求职者不去任职，造成企业招不到人。

在张宝颖看来，目前广州市的整体就业压力仍然较重。对于有些用人单位，出现短期招不到人现象，这当中包括阶段性、区域性和结构性三个原因。

他认为，广州市在上半年求人倍率只有1.05个岗位对应一名求职者，但，到第三季度之后企业提供岗位数在增长，求人倍率上升，经济有所回暖，企业订单增多，这是个阶段性的变化。另外，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里，用工情况并不相同。广州市一些老商业发达区域，如越秀区、荔湾区，基本不缺工，但在白云、番禺等区(市)制造业企业较多集中的地方，则出现短期缺口。

结构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企业要招的人，市场提供不足；市场有的人，又不适合企业使用。张宝颖说：“求职者们都热衷于做业务员、文员，但这种工作企业基本饱和。”

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说，企业需求的岗位是成“腰鼓型”状态，两头需要比较多，一头是中高以上的技术人才如工程师等，企业需求量大；另一头是有一定技能的技工人员。但就业

市场提供的相对少。另外，从求职者这方面看，供给却是“橄榄型”的，两头小，中间大，大部分属于计算机、业务员、文员、办事员等，真正能操作的、动手的工人，市场提供相对少，所以出现结构性缺口。

张宝颖说：“所以，不要轻言‘民工荒’，这只是暂时出现阶段性的普工短缺，应该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为企业真正解决一些燃眉之急。”

## “体面就业大军”呼之欲出

薪酬待遇水平是招聘与求职双方谈判的关键要素。从事人力资源工作多年的广州格凌斯建材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邓洁梅告诉记者，今年初生意一直不好，企业几乎濒临倒闭，很多工人都回老家去了，但7月以来厂里陆续接到生产订单，需要重新招聘30人，把以前工资一个月1500元提高到了1800元。

据调查，在佛山普通工人的工资比年初提高200元左右，也就是由原来的1000-1200元，提高到1200-1400元左右。“现在如果是800-1000元的工种，求职者基本不去问津。”梁振新说。

广州市对人力资源市场评估情况与佛山相似。从企业到招聘市场招工情况看，薪酬待遇比年初有所增加，一般是1200元到1500元之间招用一个新员工。大约比年初对全市600个企业的摸底调查得出的新入职人员工资1050元的数据提高了10%左右。张宝颖认为，珠三角的这个工资水平，与长三角差距不大，仍是具有吸引力的。

但是，薪酬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招工容易。梁振新认为，由于劳动力供给方面没有特别大幅增加的变化，劳动力对于就业岗位有更多的挑选机会。他强调，从劳动者心态看，他们现在的追求出现多样化，工资只是其中一个

重要要素，他们打工已不纯粹为赚钱，尤其是“80后”、“90后”，他们外出务工更多是为了增长见识、丰富人生。

“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农民工找工作第一选择要素，是技能是否可以得到提升，而把薪酬摆在了第二位。”张宝颖表示，如果解决用工短缺，能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关键还在于加强企业管理，提升企业文化，形成企业稳定就业人员。

应该立足本地产业发展，重新审视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华南师范大学人力资源研究所所长谌新民提出，这场外界所谓的“民工荒”，使原先几年前已经提出的关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农民工福利待遇和保障问题又一次反映出来了。对于农民工来说，如果干了五年、七年，这些却得不到保障，享受不到企业核心员工应该享有的东西，就会对未来产生一种不确定性。他们会想，是不是企业订单来了就要我过来，订单没了就要我走呢，最后他们只会选择“用脚来投票”。

“如果一个区域周期性出现民工短缺现象，实际上有很大的警示作用。”谌新民指出，这提示我们，既要优化产业结构上着手，也要从提高就业素质、就业质量和就业稳定性方面进行反思，要提倡造就越来越多“体面就业”的劳动者。

他说，“体面就业”的劳动者是一种稳定的、有保障的、跟我们产业发展方向一致的就业者。在珠三角地区，如果有一批经济发展需要的熟练人才，当他们的技能得到提升，当他们的生活稳定性得到保障，当他们的生活待遇得到改善，当他们的劳动得到社会承认时，在“体面就业”上得到了保证，不管在哪个岗位，他们也是企业核心员工，他们都是对珠三角未来发展具有真正价值的人力资源。

据新华社



漫画：民工荒 朱慧卿 绘

## 新闻时评

ZHENGZHOU DAILY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2 E-mail: szxw@znews.com

## 调整贪污受贿罪起刑点不能忽视公众感受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近日在人大法学院讲座上，建议调整贪污受贿罪起刑点。我国贪污受贿罪起刑点在不断调整，1979年是1000元，1988年是2000元，1997年是5000元。又一个十年过去，张军副院长显然是觉得，贪污受贿罪起刑点现在应该往上调了。(11月3日人民网)

据他介绍，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许多涉案金额为几万元的贪污受贿案件，并没有被移送法院；但一旦移送过来，法院又得依法判处，“这本身就缺乏社会公正性”。这就是说，现在贪污受贿几万元，依法应当治罪，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豁免。

但有时候又有依法办事的，贪污受贿不过几万元，结果被判刑。把起刑点调上来，涉案几万元都不移送法院，才显得公正。

张军副院长主张上调起刑点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刚够起刑点即获刑10年，而涉案一两个亿的也不过是个死缓，贪官们所受处罚区别不大。现在贪污受贿几百万并不算大，几千万甚至一两个亿的也有。假如涉案几万元的不“占用”量刑区间，那么就可以腾出量刑区间，“分配”给涉案金额巨大的。这样，贪几百万、几千万、一两个亿的才能各得其所，等差有序。

纯粹从“数量分析”来看，贪污

贿赂犯罪起刑点确实存在一条“变化曲线”，而且是向上调整的。时代在变化，社会财富增加了，货币相对在贬值。与时俱进上调起刑点，可以使非罪空间不因货币贬值而变窄，而能与过去的非罪空间大体持平。上调起刑点，可谓是起刑点“变化曲线”的内在必然。

但我们反对贪污受贿，是因为不该官员拿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反贪污受贿的伦理基础。从这种意义上说，拿1000元、5000元几万元，跟拿几百万、一两个亿性质是一样的，都是要坚决反对的。现在所谓拿不该拿的钱，主要是受贿。经济学家已经揭示，拿钱的本质是权钱

交易，会损害公共利益。而受贿少，并不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损害就小。对于大小贪污受贿行为，我们要一起反对。

如果真的像张军副院长设想的，贪污受贿几万元不入罪，无疑对政治伦理起一种消解作用。自然，不入罪，他还是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并且必然道德有亏，公众形象受损。但对于贪污受贿行为，是否违法，以法，毕竟代表了政治上对此类行为的容忍程度。不对它绳之以法，多少意味着它是可以容忍的。其结果就有可能贪污受贿公行，官员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贪多贪少而已。上调起刑点，很可能是造就

大贪巨蠹的一个诱因。

公正感，不仅存在于大蠹小贪相互之间，更关键的还在于公众的感受。在大家的印象中，美国公职人员，只能接受不多于20美元的馈赠。而在新加坡，收到价值超过200元的礼品，就得交公，否则视同贪污受贿。如果我们的官员拿几万元不受法律追究，大家就会油然而生不公正感。

社会财富增加了，官员随手可“拿”的钱也多了，但公众对权力的监督意识增强了，人们心目中的廉洁标准也越来越高。也就是说，我们的政治伦理应当趋严。而政治伦理与一般道德不同，不能光靠自律，而必须带有刚性。而上调贪污受贿犯罪起刑点，恰恰有损我们的政治伦理。

杨泽

## 北大教授死于教育医疗腐败交叉感染

我有一个好朋友是某知名大学附属医院骨科的博士生，读书期间日渐憔悴，原来每天陪导师、替导师站台操刀连轴转，实在辛苦不说，心理压力也是不能承受之重，生怕刀下没留神，免不了兜着走。所以，11月4日，当我看到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北大第一医院实习医生治死熊卓为教授的黑幕时，我没有太吃惊。

这条新闻的“看点”倒在于，针尖遇到了麦芒，专家顶上了专家，实习医生恰恰医死了医学教授，高手过招，因而得以把层层医疗黑幕揭了个底朝天。如果换作普通老百姓，北大医院权威的一句，“病人死于术后并发症肺炎，跟学生行医没有直接关系，医院对此无需承担责任”，早已把你抢白得底气全无。气急了法院见，外行告内行，打官司胜算能有几何？

只可惜，这几个实习的“菜鸟”撞在了枪口上，公众也得以从门缝里窥见了无证行医、粗暴抢救、混乱用药、篡改病历、包庇责任等等整条“医疗腐败流水线”。

熊教授碰上了实习医生，其实是遭遇了另一种“看病难”的问题。作为知名医学教授，看病自然不必请客送礼、红包伺候，试想，普通病人到北大医院可连床位都难排上。可熊教授手术是动了，却照样命丧“潜规则”，大牌医生出场，没有“三顾茅庐”的精神怎么愿意使出看家本领。大牌名医去了哪呢？一是名医“奇货可居”，中国病人这么多，而名医就那几个并且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二是名医“日理万机”，既要忙接生，还要忙教学，还有很多科研项目、出国交流，更有利润极高的走穴、办诊所、接私活。那么北大医院里的常规医疗，自然大多是一帮“学生军”上阵磨枪。

北大医院是一所“教学类医院”，也就是说，北大医院既是普通三甲医院，也是一所培养后备医生的大学。如今的大学，正如某知名大学校长所说，一些导师和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学生成了导师的廉价“打工仔”。名医没空管学生，挂羊头卖狗肉，哪管什么行医执照、处方权，北大医院“学生军”唱主角也是教育腐败的一个怪胎。

与其说，熊教授之死是医疗腐败之祸，不如说，熊教授的意外死亡是缘于“医疗腐败”和“教育腐败”的“交叉感染”。人们常提到“医患矛盾”，如今冒出了“医医矛盾”，腐败的病根子不除，个个可能被感染，人人都不会有安全感。

均匀

## 什么媒体能监督国企

近日，新华社主办的《经济参考报》对河北武安市两座铁矿的尾矿排放进行调查曝光；随后，其母公司五矿集团迅速于第二天向多家媒体发出澄清说明，称上述报道严重失实。(《中国青年报》11月4日)

一篇报道让企业和媒体绑上劲，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新鲜的是，该企业有关人士说：“这是新华社的报纸，他们怎么能这么做？我们是国有企业！”

我猜，其言下之意，无非是：新华社的报纸更该去监督民营企业，而不是监督国有企业。更吊诡的是，有人认，这是一起敏感事件，因为一个属于国家通讯社，另一个则属于骨干国企，双方“最好不要有太多的争执”。但无论从常识来看，还是从理论来说，“新华牌”报纸和“国字头”

企业的正面交锋，不存在任何的敏感性，并且根本不存在能不能监督的问题，相反，是一个如何监督到位，促使其改正缺陷的问题。

即使不是新华社的报纸，照样可以行使舆论监督的权力，舆论监督的存在与报纸本身所属单位没有关系，都是一种社会责任的担当。如果新华社的报纸不能监督国有企业，只是对公民或别的企业进行监督，那么，这样的舆论监督是不完整的监督，也是对公共利益和公众不负责任的做法。

舆论监督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被马克思形象地称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新华社的报纸不能监督国有企业背后，公然伫立着一种值得我们警醒的无知和悖论。

朱倍

## 红头文件的效应

新闻背景：山东省沂水县政府发“红头文件”要求狠抓应试教育，要求“凡是能够提高成绩的措施就要使，凡是能够提高升学率的方法就要用”。此外沂水教育系统违规办补习学校，因高考成绩不理想，补习学校要求提前一个月开学，当地教育局称这是家长的一致要求。(11月4日 新华网)

应当说，应试教育不是那一个地方的独创，应试教育之害也是社会共知。但从新闻来看，沂水之所以要推出“红头文件”的大棒来将应试教育狠抓落实，主要是基于“今年沂水县的高考严重下滑”的忧患意识。“红头文件”明确规定了改进的目标，即中考优秀率保持全市第一；本科进线人数、重点本科进线人数



和万人比全市第一。“红头文件”的分量，明显体现在统一思想，确保贯彻执行之上。

现如今，在乎高考成绩，不仅是考生和家长，高考总成绩不佳，地方政府脸上也挂不住，以至于有

的地方政府官员在电视台为高考成绩滑坡向人民道歉的事情发生。如果地方政府眼睛都盯着分数看，素质教育改革恐怕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文/李琼 漫画/曹一